



近代温州中医之研究

欧阳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近代温州中医之研究

欧阳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近代温州中医的发展是温州中医界在向疾病和对近代西方医学回应的过程中实现的,从以陈虬为代表的晚清温州中医,兴办新式中医学校、报刊和医院应对疾病和维新自救,到民国温州中医界创办中医学校和医院,进行中医的教育、传播以应对疾病和瘟疫,再到温州社会工商界成立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以医技普济众生。这不仅是中西医嬗变和汇通的历程,超越以往中西医在技术层面的碰撞,更是近代温州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温州中医之研究 / 欧阳钦著.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313-10245-4

I. ①近… II. ①欧… III. ①中医学—医学
史—研究—温州市—近代 IV.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0050 号

近代温州中医之研究

欧阳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上海世纪嘉晋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7.25 字数: 120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245-4/R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69214197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文献述评	1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概念界定	11
第一章 近代温州的地域与社会	14
第一节 近代温州自然环境、人口和卫生	14
第二节 近代温州的地域社会环境	17
第二章 温州中医的教育与传播	21
第一节 前近代温州的中医	21
第二节 近代浙江中医教育	25
第三节 近代温州中医教育与传播	33
第四节 近代温州的中医院	48
第三章 传染病与温州的应对	62
第一节 近代温州的传染病	62

第二节	传染病与温州地域社会	74
第三节	传染病与温州中医的应对	78
第四章	温州中医的嬗变与汇通	86
第一节	温州西医的传入与医院的建立	86
第二节	中医的嬗变与融通	88
结语	101
参考文献	106
后记	112

绪 论

第一节 文献述评

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就开始了。这种防治疫病的历史历代不断积累和总结,以各种方式传承下来,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形成文字记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疾病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相关治疗疾病的医书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归入古籍。对中国古代医学真正从现代意义上进行总结与规律性研究,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高峰是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三大医学史著。1920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史著作《中国医学史》,作为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对历史上的医政、名医、名著及所形成的学说、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此书另一特色是有疾病史专章,专门论述了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和天花等14种疫病的流行历史。李涛编《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①这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著。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

^①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蔡景峰撰)”条,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23~1224页。关于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著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第17卷第3期(1987),第145~148页。

时期(公元前 2697~前 1122);二、黄金时期(公元前 1121~前 960);三、争鸣时期(公元前 961~公元 1800);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 1801~1936);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医学史或疾病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的也只是对一些探索某种疫病史的介绍性论文,^①这些文章重点是对鼠疫、霍乱、猩红热等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几种疫病进行钩沉与考略。1949 年后,陈邦贤对所著的《中国医学史》(1957 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著作逐渐增加,贾得道著《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 年),是中医史专著中较具特色的著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辨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②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数据,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医学史界对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及应对措施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成果有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出版社,1953 年),在该书的第六部分“避疫与检疫”中谈到我国古代的“避疫”、“隔离病院的设置”等措施。有关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由医学专业人士完成,故“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和病理层面”,在疫病病名、病因的认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着墨颇多,而在疫病的流行状况、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分析、疫病对

^① 主要有余云岫的《霍乱沿革说略》(《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 年第 1 期)、《猩红热旧说之回顾》(《新医药》,1934 年第 2、3 期)、《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 年第 5 期);伍连德的《中国鼠疫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 年第 22 卷第 11 期)、《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1935 年第 8 卷第 4 期);关任民的《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中医医学报》,1930 年第 7 期);另外,还有日本学者井村喙全的《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略考》(《新医药》,1937 年第 4 期)、《中国疫考》(《现代医学》,1943 年第 12 期)等。

^②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著《中国医学史略》(傅芳撰)”条,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1225 页。

社会的影响以及疫病发生后社会的应对措施等方面则鲜有提及。^①

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关医学史的研究大增。俞慎初著《中国医学简史》(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著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范行准著《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于民间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此外,相关著作还有赵璞珊著《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著《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严世芸主编《中医学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

海外也有不少医学史的书籍出版,如郑曼青、林品石编《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著《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之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针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之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

^① 有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庞京周的《中国疟疾概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刘牧之的《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期);萧运春的《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姜春华的《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新中医药》,1955年第1期);朱颜的《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等,分别对猩红热、疟疾、麻风病等急性传染病的名称、疫史、症候、疗法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对中国古代疫病史的研究也受到国外一些学者的关注。1975年美国学者邓海伦(Helen Dunstan)发表《明末时疫初探》,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瘟疫的疫情及其影响。

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一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后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灸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还有一些不明著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和出版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医学史的研究开始热闹起来,主要论著有李经纬、李志东编著《中国古代医学史略》(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李良松、郭洪涛编著《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①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著《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著作:其一是马伯英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晞、洪中立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两部书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后会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出版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著《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魏子孝、聂莉芳著《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21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

^① 李良松、郭洪涛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框架。

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同时也出现一批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著《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著《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著《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黄仓、王旭东著《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随着对中国医学知识的大规模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著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著作,综合了20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21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除了医学史书籍出版之外,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后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0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此外,中医古籍过刊的整理出版也有大的举措。《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是近年来学术界整理、研究、出版的大型中医文献项目,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出版。全书汇编1897年至1949年间创刊、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医药期刊48种。所选期刊遍及温州、上海、绍兴、苏州、无锡、北京、广州、天津、太原、南京、重庆、香港等地,共计约12万页,精装(16开)212册,分五辑出版。这为中医研究者提供很好的一手资料,可谓功莫大焉。

长期以来,中国的医史学和历史学被划为两个几乎互不相干的学科。医学史有其自己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学会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成果。对于医学史学界疾病史的研究,专家们做了系统的回顾。他们也为民国以来报刊中的医学史论文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些研究成果为历史学界所引用的并不多。医学史

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等是历史学界进行同类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基础。在1958年之前的医史学界,伍连德、王吉民、陈邦贤、范行准、李涛、余云岫、陈方之、李庆坪等人对中国传染病史做了大量的研究。几乎每一种传染病专病史,都有专门的研究论著,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们的传染病专病史研究论著,着重于名实症状的考证、病因与证治。^①尤其要注意的是,伍连德除了注意利用中医文献进行传染病专史的名实症状考证,并将已知的传染病与中医诊断方面做对应研究外,还大量采用《海关医报》、各种医院报告等西文资料进行研究。^②伍氏与王吉民合作,用英文撰写《中国医学史》,其引用西文资料之丰富,迄今未有出其右者。日本学者井村哮全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个利用中国地方志去研究疫史。^③

在区域疾病史领域,赖文和她的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999年,赖文和李永宸完成了“岭南古代疫病史研究”,但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出版。她们从岭南古代疫情资料出发,从定性、定量、相关因素筛选、病种考证等方面对整理古疫情资料的方法论进行了初步探讨,总结了岭南地区1911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了自然灾害、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和国内交往等因素对于这一地区古代瘟疫流行的影响,提出广东人间鼠疫流行可能与地震活动有关、霍乱与旱灾有较明显的伴发关系等十分重要的观点。^④岭南瘟疫史的

① 对这些医史前辈研究旨趣的概括引自赖文、李永宸、张涛、庞宏广:《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比方说余云岫《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第27卷第5期)一文,探究的是猩红热的名称、疫史、病因、证候、治疗。陈方之在《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史学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号)一文中关注猩红热病的辨别、病名、证候与治疗。李庆坪在《我国白喉考略》(《医史学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号)一文中考察白喉古今病名的演变与疫史。李涛在《中国结核病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12期)一文从医学文献中类结核病的资料中去分析结核病,考查中医的认识。王吉民的《中国麻风病史》(《博医会报》,1930年第8期)有同样的研究旨趣。

② 伍连德、陈永汉、伯力士、伍长耀:《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6年版,第1~53页;伍连德:《霍乱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7年版;Wu Lien-teh,“Preliminary Report Upon Cholera in Investigation in Shanghai Summer 1930”,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Report,1931,pp.1-57.

③ 井村哮全:《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一)》,《新医药》,1937年第5卷第4期。

④ 赖文教授对她们以往研究的概括参见赖文、李永宸、张涛、庞宏广:《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他们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赖文、李永宸:《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1期;赖文、李禾、李永宸:《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分析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5期;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4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地区1911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创刊号;李永宸、赖文:《广东人间鼠疫流行与地震的关系(1867~1911)》,《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1期;李永宸、赖文:《岭南霍乱流行情况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0年第3期。

研究,代表了目前大陆区域瘟疫病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岭南区域瘟疫病史只是她们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已完成但尚未发表的还包括张涛的《四川古代疫情研究》和庞宏广《山西古代疫情研究》。前者结合自然和社会因素进行疫情分析,后者研究了现今山西境内1911年以前发生的疫情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烈度分布,并对某些年份的疫病类型进行判别。^①由于传染病史研究论著众多,即使医史学界的学术综述也很难收集齐全,例如都忽略了王吉民、李涛、伍连德以及零星外国研究者用英文发表的研究论文。另外,《1939~1944年十种法定传染病流行史料》、《苏州地区历史疫情资料辑存》和《上海疫病灾害史料(1454~1989)》是三种未公开出版且为学界忽略的疫病灾害史料集,系统收集了给定时间及区域中十种法定传染病的档案资料、地方报刊中的疫病资料和上海的疫病资料,有的还对疫病灾害的发生原因、历史变迁及展望与对策进行探讨,颇能显示从事疫史资料整理的医疗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②除此之外,李玉偿的博士论文《环境与入: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对区域疾病研究作了新的探索。上述综述论文对于国内外历史学者的研究亦有遗漏的地方,其研究表明大陆对于中国的传染病史研究着重于鼠疫和霍乱这两个病种,目前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社会对于这两种疫病的应对。

台湾学术界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医疗社会史已经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影响很大的“生命医疗史”的研究旨趣是要打破科学史的内外史之分,从而将医学史视为一种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课题。这样,生命医疗史与科学史基本上没有关系,而形成杜正胜所构想的新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③近些年来,台湾地区的不少相关研究,都是沿着这一构想进行。比较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事医学史研究的梁其姿的研究显得与众不同。以她近期的研究为例,在《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一文中,她通过分析不同时代对于“疔/癩”、“大风”、“麻风”这几个病名的描述、病因分析、疗法等,把握疾病分类概念的变化及其背景。从研究思路上看,和大陆医史前辈传染病专病史的研究有些不同。梁其姿的兴趣在于从“这个具体例子来看中国传统医学里疾病分类方式的历

① 庞宏广:《山西古代疫情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② 范日新编著:《中国1939~1944年十种法定传染病流行史料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防疫司1955年内部印行本;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地区历史疫情资料辑存》,内部印行本;林发雄主编:《上海疫病灾害史料(1454~1989)》,1990年内部印行本。

③ 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1995年第1期,第113~153页。

史”。与其将她的这一研究看成是社会史的，倒不如说是开辟了传染病专病史的崭新的研究方向。^① 在一篇题为《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的论文中，她通过分析自元至清时期中国医界对于疾病与方土之间关系看法的变化，指出这些变化“不仅部分修改了原有疾病分类与治疗的原则，而且对明清之际的疫病的病因理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和西方进行了对比。与此类似的还有皮国立的《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一书。

在大陆历史学界，疫史被列入灾害史研究的一个内容。对于区域疫灾史比较系统的研究是余新忠著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② 冯尔康和梁其姿在此书的序言中对本书的内容和评价做了很好的归纳。梁其姿从医学史研究的思路方面指出：“作者不轻率地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来解释明清疾疫的性质与发展，而处处谨慎地从原始资料出发，分析每次疾疫的现象及其社会影响。”在杨念群看来，该书作者关注的是瘟疫的社会史，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反应，他也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之后，杨念群也按照此思路写出《再造病人》一书。除余新忠外，曹树基在关于明代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的研究中，在病种判断上采用了鼠疫专家伍连德的看法，并采用和井村喙全基本一致的研究方法，“复原”明代后期及末年华北的鼠疫流行区域。^③ 他的贡献在于试图揭示传染病与历史的关系，从传染病史角度去重新思考重大历史事件的演进。台湾学者张嘉凤最近一项关于满洲在征服部族、朝鲜和明朝的军事活动中对天花防治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天花在军事历史中的地位。两项研究都揭示出传染病在历史中的地位。曹树基和李玉尚合作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就不同状态下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之关系、鼠疫的命名、鼠疫发生或者流行的机制与模式、社会对于鼠疫的应对等鼠疫专病史的各个方

① 梁其姿其他的医学史论文，参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4～549页的著作目录。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二分，第399～438页。

②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面进行一系列的研究。^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和社会应对机制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问题。首先体现在医学史界和历史学界基本上是在各自的模式下展开研究的,各自为政,互不相通。医学史界关注的多是疫病病名、病因的认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而史学界则侧重于疫病对社会的影响及疫病发生后社会的应对机制、救助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必须促成二者之间的联姻,从多视角、方法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疫病的流行、防治及社会的应对措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疫病流行的状况、特点、规律、社会应对机制和疫病对社会的影响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其次,在疫病防治及社会应对机制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一般是就某一朝代疫病流行特点和救助措施展开论述的,缺乏整体性和全面性。个别涉及整个中国古代疫病流行与救助的文章则过于简略,缺乏深度与广度。相关的研究专著,见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主要研究的是历代的疫情概况、卫生和防疫知识及医事制度等方面。余新忠的两部大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和《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重点研究的只是明末以来江南地区疫病流行及国家和社会的疫病反应机制,而对其他朝代和地区皆未提及。这些研究成果尚不能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疫病流行的状况和社会应对机制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清晰的认识。从事医学史研究的学者需要加强史学修养,而历史学界的研究人员,则需要加强医学、疫病学和卫生学方面的修养,相互之间多加交流,以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突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一些具有传统中国医学和史学训练的学者在进入这个领域,只是他们目前还在地域医学研究这一块探索,不久的将来,这些具有两种学术训练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于地域医学的研究,开始多为整理地方医学文献特别是当地古代地方医

^① 参见曹树基:《光绪年间云南的鼠疫流行——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历史人类学集刊》2003年创刊号;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于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东西方对于鼠疫的应对》,《社会科学报》2003年5月8日;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学的文献古籍。张玉才教授主编的《新安医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发行,是安徽地区的地域医学研究集大成者,旨在对20年来发掘、整理、研究新安医学的成果作一次全面总结。新安王氏医学传承人王键领衔编撰的《新安医学精华丛书》,近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共分10册260余万字,内容涉及新安医家学术、医话、医论、医案、方药、针灸以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地域医学史志研究以前为学界所忽视,只有部分地方史志研究者关注较多,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很多地方出现一批研究地方医学的著作成果值得学界关注。如刘时觉的《温州近代医学著作集成》一书,此书为《温州文献丛书》一部分,于2005年6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刘时觉在地域医学古籍整理方面做出努力,由于收集的古籍数量有限,很多传世的医学出版古籍和抄本没有被收录。但其对永嘉医派的考证和研究则填补了南宋医学学派研究的空白,提出了“永嘉医派”的概念,充实了中医各家学说史的内容,是温州地域医学和地方志研究的一大贡献。^① 瞿汉云的《瑞安医学史略》和《瑞安卫生志》也是类似的研究。关于温州地域医学的相关研究历史学和医疗史学界零散有一些相关文章发表,如胡珠生的《戊戌变法时期温州的〈利济学堂报〉》(《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2008年西北大学的吴幼叶以相同名字的不同视角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刘时觉、陈克正、杨力人、朱国庆、李珍、瞿汉云的《晚清的利济医院和利济医学堂》(《中医药文化》2003年第3期)和《近代温州医学代表人物和维新思潮》(《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2期),郑国志、郑国庆的《陈虬生平及利济医学堂的历史沿革》(《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第3期)等文章。此外,有一些研究单个医家的学术思想文章,如陈克正的《浙南名医徐润之学术思想略述》(《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984年第8期)、周朝进、曹云霖的《略述南宗景先生的学术经验》(《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也有反映温州地方中西医相互影响的文章,如陈勇的《苏慧廉夫妇笔下的近代温州医学》(《温州医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等。近年来,这些文章逐渐增多,从某一方面来说表明温州地域医学史研究在逐步深入,在此不一一举例。

自生民以来,人类即饱受各种疫病的严重侵害;就是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其威胁,人类与疫病的斗争历史还将一直延续下去。认清历史,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提供历史的借鉴,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理

^① 刘时觉:《永嘉医派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

论意义,其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概念界定

本书的核心是探讨温州地区历史上的中医与疾病、社会环境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上述各种因素如何综合地影响温州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医当然与国家或者社会有关,但它首先是一个与技术和疾病有关的科学问题。这一视野中,中医是环境、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表征,也是笔者探讨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角度。本书也希望这一分析框架成为解释温州近代历史的新思路。

利用温州地区丰富的史料,对地方史志资料进行分析,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中医史研究而言,具有文本示范意义。研究的深入程度有时完全取决于资料的详尽程度。本书主要内容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近代温州的自然、地域社会环境、人口和卫生;二是近代温州中医学的传播与教育;三是传染病与温州社会以及中医的应对;四是温州中医的嬗变与汇通;五是结语。

一、时间

梁其姿认为 16 世纪是中国疾病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中国已纳入世界体系当中,几种新的流行病进入中国,中国医学也面临新的问题。但是温州地区的中医面临这一问题却相对要晚,更重要的冲击来自社会,特别是维新变法时期。故本研究时间起点是维新变法时期到民国时期。

二、地域

本书所要考察的重点主要是构成温州核心区域的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泰顺五县。此五县在历史上一直是温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重镇,相互联系紧密,故可视为同一经济文化单元。

三、环境

环境是指与体系有关的周围客观事物的总和。在环境学上,中心事物是人类,因而环境分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和自然现象的总体,有时简称为环境。在物质

中,除了空气、水、岩石外,还有动植物和微生物。如果以人类为主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由岩石、地貌、土壤、气候、生物等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经济环境指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经人类开发利用后形成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经济结构,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和城乡居民点等各种生产力实体的地域配置条件和结构状况。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人口、社会、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地域分布特征和组织结构关系。在本书中,重点是人文社会环境。

四、中医

所谓中医是相对西医而言的,西医其实应该叫现代医学,但在近代西方医学没有与现代科学结合之前,依然是与中国传统医学并列的传统医学。在本研究当中,中医不只是作为一个学科或者技术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传统文化相混杂的中医一起作为一个不可剥离的整体来研究,是一种知识和制度的混合体。

五、瘟疫和温病

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关于疫病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从《内经》起就是从疾病的性质和程度强弱来认识疫病概念的。《内经》不仅明确指出疫病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且用温疔、热病的概念,揭示了疫病的温热性质,用“疫”和“疔”之别来提示疫病有传染性强弱之分。之后的医家在《内经》基础上,经历了一段温疫和瘟疫混淆不清的阶段,到明清时期温病与疫病分离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瘟疫、杂疫概念出现,温疫和寒疫的分类明确,而瘟疫与温疫混用。但最终清楚地界定了瘟疫与温疫虽都属于温热性质的疫病,但二者的不同在于瘟疫更强调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自《伤寒杂病论》起就开始揭示了寒性疫病的内涵,提示疫病既有较为多见的温热性质的一面,也有具有寒性的一面,进一步扩大了疫病的概念认识。而清代医家又在温热性疫病中将一些比较特异的疫病命名为杂疫。因此,我们不能像现在很多文献中将疫病称为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更不能将瘟疫与温疫混淆不清。中国古代医家对疫病的定义是:凡是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疾病都叫疫病,而无论其传染性是否强烈、流行是否广泛。温疫是指具有温热性质的疫病,寒疫自然是指具有寒性的疫病。这二者强调的是疫病的性质。而所谓湿热疫、燥热疫都属于温疫病的范畴,是温疫概念的延伸。瘟疫则是指具有强烈传染